

## 《国殇》的主题与兵学文献价值

李桂生

《国殇》是屈原赞颂为国捐躯的楚军将士的一篇叙事诗，反映了战国末期的战争情况，是楚辞中唯一描述战争的作品，是一篇重要的兵学文献。

一、《国殇》的主题不是祭祀人鬼或人神，而是叙述与歌颂楚军对敌作战与阵亡的将士，其风格不是浪漫主义祭祀诗，而是现实主义叙事诗。《国殇》是屈原《九歌》中的一篇。《九歌》共有十一首诗，依次为《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一般认为，《九歌》是祭祀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诗。具体说来，《东皇太一》的祭祀对象，一般认为是最高的天神，也有的说是上帝、伏羲、春神、战神、太乙星君、北斗星君等等。这是一篇群巫合唱诗，诗中所叙，场面庄严肃穆，服饰繁盛华丽，仪礼逶迤有致，气氛恍惚迷离，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天神的崇敬取悦之情。《云中君》的祭祀对象，一般认为是云神丰隆，也有的说是月神、云梦泽之神等。此篇先叙巫女沐浴更衣，候迎云神，次叙云神居处、行色，后叙云神蹁然而来，却又飘然而去，云卷云舒，恍惚缥缈，有人神恋的情致。《湘君》《湘夫人》应该是姊妹篇，祭祀湘水之神，叙述她们凄美的爱情。湘君与湘夫人是原始宗教中的一对配偶神，据说是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作者根据沅湘

地区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和历史传说，用委婉绮丽的笔调，叙述舜之二妃听说舜在南巡途中致病于苍梧并葬于九嶷之山，悲痛欲绝，赶赴洞庭之滨，投湘水而死的故事。《大司命》《少司命》也应该是姊妹篇，祭祀男女两位司命神。前一篇写大司命出行时的声威和女巫对他离去的忧愁怀恋；后一篇写少司命的美丽多情与端庄。《东君》，祭祀太阳神。诗篇按照太阳将出、太阳初升、日行中天、太阳西下的过程来写太阳神的行踪，赞颂了太阳神的光明正直。《河伯》，祭祀黄河神，有的说是洛水神。一般认为，河伯之名始于战国，又名冯夷。楚国先有熊绎在中原受封而南奔荆楚，后有楚庄王北上问鼎中原，楚国民间自古就有淫祀之风，全然不顾“祭不越望”的规矩，对远离南方的黄河水神隆礼有加。河伯以鱼为屋，龙鳞为堂，珠贝为宫，极具神话色彩。

《山鬼》，祭祀巫山神女。巫山神女感情丰富、形象美丽。本篇叙述巫山神女等待所爱之人而不来，忧思满腹，独自归去。巫山神女大概就是宋玉《高唐赋》中楚怀王所梦见的神女，神女对怀王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sup>[1]</sup>后人又说，巫山神女就是瑶姬。《国殇》，一般认为祭祀人鬼或人神，是为为国捐躯的楚军将士而作的祭歌。最后一篇《礼魂》，是送神曲，只有短短的五句。

在《九歌》的十一篇作品中，前九篇各主祭一神，辞藻华丽缥缈，极尽虚构想象之能事，多以神话传说与历史传说为题材，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原始宗教气氛。说它们是祭祀诗，是能够接收的，也

是比较符合《九歌》原貌的。但很显然，《国殇》是与它篇不同的作品，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看不出有任何的神话色彩和宗教色彩，也没有丰富的想象与虚构。虽然我们不能把《国殇》所描写和叙述的内容与历史上楚国的某一场战争一对一的进行比照<sup>①</sup>，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国殇》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它艺术地再现与反映了战国末期楚国最为惨烈的某场战争或战役，是一首现实主义的叙事诗，也是一首充满悲壮之情的悼歌和颂歌，是一篇被人忽略了的军旅诗歌，具有很高的兵学文献价值。

《国殇》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重在叙事，饱含悲壮之情，生动地叙述与再现了楚军与敌人交战而全军覆没的场景：

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sup>②</sup>。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sup>③</sup>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埋两轮兮系驷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sup>①</sup>有学者认为《国殇》记述的是秦楚丹阳之战，根据是楚国历代战争在《史记》里都有记载，惟有丹阳一战楚国军队如诗中所言“严杀尽兮弃原野”，全军覆没。（见罗漫《〈国殇〉的创作背景与自卫型爱国精神》，《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90页）。但以笔者看，屈原叙述的是楚国对敌作战，歌颂的是楚国阵亡的将士，但不是那一场具体的战争，不是历史记录，而是文学创作，而是综合了楚国多场败战情况。亦有学者认为，根据“带长剑兮挟秦弓”一句，表明屈原描写的这场战争确是楚国与秦军的战争，表现了牺牲的楚军士卒用胳膊夹住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强弓（见黄露生《〈国殇〉中的“不解之谜”》，《湖南第一师范学报》1998年第1期）。但笔者深感疑惑：要是以此推论，“操吴戈兮披犀甲”岂不是楚国与吴国交战？要不就是楚国与秦、吴联军作战？这种顾此失彼的猜想显然不攻自破。

<sup>②</sup>这句话的意思一直有争议，王逸《楚辞章句》注云：“错，交也；短兵，刀剑也。言戎车相迫，轮毂交错，长兵不施，故用刀剑以相接击也。”此后的许多学问大家如洪兴祖、朱熹、王夫之、戴震、郭沫若、闻一多、姜亮夫、金开诚等均采此说，以为这是敌我双方交战的激烈场景。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这句话不是写交战，而是与前一句“操吴戈兮披犀甲”相连，写部队进发，奔赴战场，应该理解为：我方战车一线横列，车与车之间距离近，以致车毂互相摩错，手执短兵武器的步卒紧随战车之后。（见戎辉兵《车错毂兮短兵接新解》，《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3期，188页）。我认为后一观点颇有道理，故从之。

<sup>③</sup>一般理解为交战双方对射，箭矢交错坠落。但从行文与结构看来，《国殇》开头一二句并不是描写双方交战的激烈场面，而是叙写楚国将士全副武装奔赴战场的情景，而不是战车碰撞、短兵相接的厮杀场景，若是，则三、四句岂不是不分敌我，乱射一气？《国殇》的结构与线索，当是楚军奔赴战场（1、2句）——敌人强大众多，万箭齐发，飞向楚军（3、4句）——楚军遭受重创（5、6句）——楚军拼死抵抗（7、8句）——楚军全军覆没，上天为之震怒（9、10句）——追叙楚军长途行军，义无反顾，无怨无悔（11—14句）——歌颂与悼念（15—18句）。只有这样理解《国殇》的结构线索，才不至于产生文理混乱。

[2]

这一部分告诉我们：楚军士卒手持吴国制造的戈，穿戴犀牛皮做成的甲冑，战车奔驰，车毂摩错，徒兵跟随在战车之后。敌人旌旗蔽日，如黑压压的云堆。敌人箭矢齐发，交错着落在我方阵地。我军将士冒矢争先，敌人侵袭我车阵，践踏我兵行，左骖倒地而死，右骖为刃所伤。楚军把车轮埋在地下，缚住驾车的战马，形成稳固的方队，以阻止敌人进攻，将领手持枹槌，击鼓壮威，指挥军队，英勇杀敌，但终因寡不敌众，全部战死，尸弃原野。天地为之塌陷，神灵为之震怒。

第二部分重在抒情，追叙楚军带剑持弓、长途跋涉地艰苦行军；热烈赞颂他们义无反顾、九死无悔的凛然气概，勇武刚强、宁死不屈的高尚节操，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的牺牲精神；抒发了对死者的深切悼念与崇敬之情：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迢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sup>④</sup>魂魄兮为鬼雄！<sup>[3]</sup>

这一部分告诉我们：楚国的将士既然出发了，就没有打算活着回来。路途遥远，战车在平原上奔驰。身佩长剑、手持秦国制造的弓箭，即使身首相离，也无怨无悔。确实勇武刚强啊，即使到生命最后，也宁死不屈。身体是死掉了，可是精神永存，你们的魂魄必将化作鬼中

<sup>④</sup>有学者认为“子”是以第二人称称呼，说明受祭者为死去的楚国将士，以此可以推论《国殇》为祭祀诗。但笔者不禁要问，若第二人称行文，就是祭祀诗，那么《国殇》第一部分以第三人称行文，该是什么诗呢？

英雄！

这样一首主题鲜明、形制短小的叙事诗，在学术界却一般认为是祭祀诗，而对祭祀对象或目的又主要有如下诸说：（1）祭祀战争中的死难者。（2）祭祀强鬼。（3）驱鬼。（4）军雩祭。（5）祭祀战神蚩尤。<sup>[4]</sup>

我以为，只要稍稍研读原文，就会发现，以上诸说，后四种显然先入为主，牵强附会，多为臆说，且愈说愈远，缺乏确凿有力的证据，不可置信，在此无须赘驳。惟有第一种似乎比较接近事实，但也并不妥帖。理由有四：

其一、在《国殇》里，没有关于祭祀的仪式和用语，不管主张其祭祀对象是什么，但只要说它是祭歌，都令人感觉牵强。

其二、《国殇》通篇叙事和抒情，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说它是颂歌和悼歌较为合适。

其三、《国殇》篇名为“国殇”，没有以“人神”、“人鬼”命名，而《九歌》中的祭祀诗均以被祭祀的神鬼之名名篇，如《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等九篇均是如此，惟有《国殇》例外。

其四、《国殇》最后两句“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与人神、人鬼确有关联，但这两句真正的意思是对死者的赞颂与哀悼，是对死者的祝愿与祈祷，与祭祀人神、人鬼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把《国殇》主题误读为祭祀诗呢？这有多方

面的原因：

其一、从学术史看来，由于大多数学者受王逸《楚辞章句》关于《九歌》乃祭祀诗的传统观念影响，一直跳不出祭祀主题的框框，先认定它是祭诗，然后多方申说与论证，却愈说愈远，愈说愈令人不解。

其二、从《九歌》的体系结构讲，研究者往往把《九歌》的祭祀对象系统归结为天神、地祇、人鬼三个子系统，若承认《国殇》非祭祀诗，则破坏了《九歌》天、地、人完整的祭祀对象系统及其完美性，也违背了《九歌》“祭祀”的主题思想，《国殇》便成了“孤魂野鬼”，无所归依。这对《楚辞》研究者来说，内心或潜意识上是难以接收的，所以尽量把它作为祭祀诗来解读。

其三、从《国殇》的文本看，最后两句“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若与前文割裂开来理解，也确实容易产生祭祀人鬼、人神的歧义。

其四、从研究对象看，楚辞属文学范畴，研究者也一般从文学角度研究，而文学有其局限性，敷衍发挥的成分较多，常常把推测、臆说、想象当作事实或结论。

其五、从研究主体看，文学研究者往往崇奇尚怪，对待研究成果，也常常觉得愈奇愈好，愈怪愈佳，似乎这样才有新意，而往往缺乏实证精神。

**二、《国殇》是一首现实主义的军旅诗歌，具有重要的兵学文献价值。**正确理解与把握《国殇》的主题是对《国殇》兵学文献价值进

行释读的前提。只有承认《国殇》是一篇现实主义叙事诗，是一首颂歌和悼歌，而非浪漫主义的、带有神话色彩和宗教色彩的祭祀诗，才能得出《国殇》是一篇兵学文献的较为中肯的认识，其兵学文献价值才能得到肯定与落实，并在兵学文化与兵家文献的研究中得到开掘和利用。

（一）《国殇》对先秦的兵种研究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一般认为，春秋时期以车兵为主，春秋末期步兵才成为独立的兵种；战国时期以步兵、骑兵为主，车兵为辅。先秦史著作中往往这样表述：“春秋时代奴隶主贵族都用马车作战，双方往往排列成了整齐的车阵，然后交战……可是到了战国时代，情况就不同了……大规模的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已代替了整齐车阵的冲击战。”<sup>[5]</sup>但在《国殇》里所反映的兵种构成情况却不完全是这样的，它所描写的战争以车兵为主、步兵为辅的兵种构成情况，说明战国时期车兵在某些特定的战争中仍然是主要兵种。《国殇》云：“车错毂兮短兵接。”这里所说的“短兵”，本指短兵器，此处用了借代修辞，指手持短兵器的步卒。所以这句话反映出来的兵种是车兵和徒兵两个兵种。《国殇》又云：“凌余阵兮躐余行。”这里所说的“阵”是车阵，所说的“行”是兵行，也就是步兵。《国殇》又云：“带长剑兮挟秦弓。”长剑是短兵器，秦弓是远程兵器。这句话未与车阵相联系，而是独立表述，故而描述的应该是步卒的武器装束（当然战车上的甲士也持弓带剑或持戟）。这三处相互印证，前后一致，说明楚国投入这场战争或战役的就是车兵与徒兵两

个兵种，而以车兵为主。

（二）《国殇》对研究先秦的战争样式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国殇》反映了这场战争以车战为主、步战为辅的战争样式，说明在战国时期，车战在某些特定的战争、战役中仍然是主要作战样式。一般认为，春秋时代的战争样式主要是车战。交战双方往往排列成整齐的车阵，然后交战，而且持续时间较短，一两天甚至一个早上就能决定胜负。《左传·成公二年》记载齐晋鞌之战曰：

师陈于鞌。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卻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剪灭此而朝食。”<sup>[6]</sup>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齐晋两国军队在鞌摆开阵列。邴夏为齐侯驾车，逢丑父为车右；晋解张为卻克驾车，郑丘缓为车右。齐侯说：“等我灭掉晋军，再回去吃早饭。”

不仅鞌之战如此，而且春秋时期晋、楚之间争霸的几次大战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都在一两天内决胜负，即使吴攻入楚国，从柏举之战到长驱直入楚都郢，一度灭楚，前后亦不过十日。可是战国时期，军队规模扩大，动辄几十万，交战双方旷日持久，往往好几年才决出胜负。《战国策·赵策三》记载赵奢语曰：

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万距此，奚难哉？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即君之齐已。齐以二十万之众攻荆，五年乃罢；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

乃归。<sup>[7]</sup>

从这段材料分析，战国时期军队规模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兼并战争的结果。春秋时期诸侯国多，因而城小，人少，军队规模也小。可是，战国时期诸侯国少，所以城大，人多，军队规模也就大。战国时期一个国家的规模往往是春秋时期几个国家、甚至十几个国家的规模。这种规模的扩大，实际上是通过兼并实现的。它不是自然的扩大，而是人为的扩大。

其实，战争规模的扩大，战争时间的拉长，早在春秋末期已经出现，《孙子兵法·用间》云：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sup>[8]</sup>

春秋末期，步战逐渐从车战的从属地位中独立出来，形成车战、步战同时并存，且以车战为主，步战为辅的局面。到了战国时期，除了车战、步战之外，还出现了骑战，并逐渐占据主要地位。一般认为，春秋末期以车战为主、步战为辅；战国时期以步战、骑战为主，车战为辅。但从《国殇》看来，这个认识并不是绝对的。应该说，在不同的战争中，战争样式会不一样。《国殇》是屈原的创作，是战国末期的作品，它所描写的战争就是以车战为主，以步战为辅，但没有骑战。

（三）《国殇》对研究先秦武器装备及武器贸易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在《国殇》里，提到了吴戈、秦弓、犀甲、矢、剑、车等兵器或

装备。这表明楚国在军事装备方面是比较先进的，它装备了吴国出产的戈和秦国出产的剑。这说明最迟到了战国时期，各国就已经有了武器贸易与交换。

（四）《国殇》对先秦时期的作战方式研究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平原忽兮路迢远”一句透露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楚军对敌作战，是平原野战，也是长途阻击战。既然是平原野战，当然以车战为主；既然是长途阻击战，自然也要用到步兵。这与“车错毂兮短兵接”所透露的信息是相吻合的。一般说来，春秋时期车战居多，而且往往避免攻城。《孙子兵法·谋攻》说：

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橧轘辘，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闾，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sup>[9]</sup>

主要原因就是城高而坚，牺牲很大，却难以攻取；准备攻城器械，又多费时日，枉费粮草。故而多采取两军在宽阔地带列车而战的野战方式。而到战国时期，长途奔袭、侧翼包抄、迂回进击的运动战居多，车战这种笨重而呆板的庞大方阵式作战居于次要地位。但从《国殇》看，车战方式仍然可以作为主要作战方式，主要是针对平原作战地点而采取的战法。

（五）《国殇》对战国时期征兵、募兵制度研究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先秦时期，一般征集或招募男子当兵。但是在守城战中，也有女子编队守城的，这在先秦兵学文献中有记载。服役年龄一般在十五至

六十岁。“国殇”之“殇”<sup>⑤</sup>是指不到二十岁就死亡，也就是未成年而死。这说明楚国征兵对象多为二十岁以下男子，而中壮年兵丁非常少。当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战国末期战争伤亡很大，兵源补充出现低龄化的现象。

（六）《国殇》对《孙子兵法》的成书研究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关于《孙子兵法》的成书，直到现在还有争论。学术界一般认为《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但也有人如钱穆、齐思和、李零等，认为《孙子兵法》成书于战国时期或春秋末到战国间。根据之一就是，《国殇》云“埋两轮兮系四马”与《孙子兵法》云“方马埋轮，未足恃也”两相吻合，说明“方马埋轮”是春秋战国通用的紧急御敌之法。它佐证了《孙子兵法》的最后成书与定型当在春秋末至战国的推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 [参考文献]

- [1] 朱碧莲. 宋玉辞赋译解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73.
- [2] [3] 宋. 洪兴祖. 楚辞补注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82-83, 83.
- [4] 陈青松. 国殇研究观点述评 [J]. 娄底师专学报, 1999, (2) : 23-27.
- [5] 杨宽. 战国史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288-289.
- [6]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M]. 北京：中华书局, 1990. 791.

<sup>⑤</sup>有学者认为，凡是非正常死亡都谓之“殇”。笔者以为，“殇”就是“夭折”的意思。屈原之所以以“殇”名之，不仅是由于那些将士属于非正常死亡，即因战事而死，而且也是早夭。故“国殇”之“殇”指为国战死的未成年人。

[7]郭人民. 战国策校注系年[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 385.

[8][9]李零. 吴孙子发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125, 47-48.

作者简介: 李桂生(1967-), 男, 中国江西省宁都县人, 文学博士, 历史学博士后, 现任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鄂东教育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究方向为中国兵学、中国管理哲学。

E-mail:liguisheng89@yahoo.com.cn